

美丽与悲凉

许永强

一天，德国音乐家梅亚贝尔（1791—1864）为了一点小事和妻子争吵起来。可事情很小，他不希望再吵闹下去，却也不愿意向妻子求饶。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，他在钢琴面前坐下，弹起了友人肖邦送来的《夜曲》。很快，他的身心都沉浸在乐曲之中，跟妻子吵架的不快已抛到九霄云外。

过了一会儿，怒气未消的妻子也为那优美的旋律所吸引，一步一步走到钢琴边，在十分激动中抱住了丈夫，热烈地亲吻起来……肖邦的《夜曲》就这么使一对争吵中的夫妇重归于好。

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总是非常美丽，但美丽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无限的忧伤与悲凉。

就拿这位“钢琴诗人”肖邦来说，天性的忧郁以及家国难回的遭际，总是使他带着“最高的十字架”，长期处于悲凉与痛苦之中。在给波兰的朋友波托茨卡娅的信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就像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一样，我从来也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支和诺尔维德弹琴。他们中有一个来的时候，我就坐下弹琴，有时始终一句话也不说。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，这眼泪难道不是民族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吗？”其实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。总之，过分的敏感、经济上毫无保障的生活，终于把这位音乐家推到了绝望的境地。他叹息道：“为了自己的眷恋，我受了致命伤。”

时至今日，恐怕无人会否认海明威与福克纳的伟大，还有他们的作品带给我们的美丽享受与锤子敲击灵魂般的震撼。但坚强自大如海明威，到了晚年，“事实上，则于每晨早起，站立案前翻弄未完成稿，不言不语，未能再着一字”，“间或向爱荷达故居故地远眺，目光则日益冷漠，视而不见，或与医生同坐北窗下，默默垂泪”。这真的很难与那个写出了《丧钟为谁而鸣》和《老人与海》的“硬汉子”海明威联系在一起。这位向以强硬著称的大作家最终无法控制悲凉的侵袭，终至饮弹自戕。与海明威相比，福克纳的晚年情状也好不到哪里去：“独坐书房中，默默眺望着窗外，他仍是一个羞怯的苦恼人，疑虑、担忧，特别是失落和黑暗逼近感，继续困扰着他。”“失落感与黑暗逼近感”，可真是概括了大多作家的晚年情状。看来，除了生存方面的一般痛苦外，作家、艺术家至少还比他人更多一层痛苦，那就是对创作才华一旦消逝的恐惧。

托尔斯泰是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”，但晚年走失于火车站，死在风雪中；《红楼梦》是中国“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”，但曹雪芹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，“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才最终写成；梵高的画如今已成为富豪们竞争奢华的藏品，但这位“世界上最孤独的人”生前为了一点点一厢情愿的爱，甚至向一个小妓女奉献一只耳朵；与梵高一样，高更也是印象派的巨擘，但为了自己心爱的艺术，他曾抛妻别子，也放弃了数目不菲的银行家产业，独自一人前往塔希提岛过一种类似野人的生活……

人间悲剧何其多，而作家们在为人间奉献美丽、丰富与快乐的同时，也积聚着他们自身终将不免的悲怅。这种伤痛固然来自日渐“圣者”的情怀，同时也是职业选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如果做个成功的商人或其他行道者，尽可平安、富贵地度过一生，何来那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忧伤、恐惧与悲凉！

然而，正是有了这些忧伤、恐惧与悲凉，人间才有那么多美丽温馨的故事，才有那日益丰富且永运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。让我们向那些深受苦难、饱经悲凉和沧桑、高贵而又伟大的灵魂致敬！

河套

程远

镇上只有一条河流，从山里顺沟淌来，细细的，沿着连绵起伏的北山脚下，到镇上，确切地说是到小火车站对面卫生所房后才开始放宽起来，但也就四五米吧，踩几块石头就可以过去。再往下，过104户最后一趟房子，快到中学的围墙时，又拓展些，这时岸上人家就搭了木板桥：两边是废弃的铁轨，木板夹在中间。至此，河流便有了些样子，可以平铺直叙大大方方地穿镇而过了，直到熊腩沟沟口一座灰褐色的石砬子下，转了三十几度弯，与镇里通往镇外的那条公路并肩而行。不多远，汇入另一条河。

那条河是从莫日红山上流下来的，经过十几个村庄后，在一个叫做黑石木的地方汇入浑河。

守望
储青
摄

那条河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。或许就没有名字。就是流过镇上的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统称为大河或河套。

走啊！到大河抓鱼去呀。

我妈呢？去河套洗衣服了。

我们总是这样说。

如你所知，我家住在粮站前的那趟白灰房里，一共四家，我家把西头。西头除了菜园子，就是一条排水沟，所以进出都走东头，经过刘波孙朋杨柏栋三家门前，到下院的巷子上。再下行，就是公路。公路上边是粮站，下边是中学，如果去河套，沿着中学围墙边的羊肠小道一直走，过井沿和一片大地，就到了。

与铁道大道一样，河套也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
游泳，抓鱼，放鸭放鹅，浣洗衣服，冲刷家什，到学校后山摘野果，采野菜，捡蘑菇，甚至用弹弓打鸟，都会来到这里。上述这些，我也并非样样擅长，比如抓鱼、打鸟，参与的就很少，就是伙伴们都喜欢的游泳，我也基本不会，哪怕揍狗刨呢。而放鸭放鹅，浣洗衣服，冲刷家什，这些日常活计却是一个都不能少，因为我家没有女孩，母亲又是体弱多病，父亲上班，哥哥上学，这些被男孩子所不屑的事情，自然就落到我的身上。

但我还是经常同伙伴们去河套玩，和他们一起挖河床，搬石头，砌河坝，让水面长高，然后看他们甩掉裤衩一头扎进水里，羡慕得不得了。当然，这时我也一定是光着屁股坐在河里的石头上，时不时地把头埋进水里，练习憋气。终于有一天中午放学，我和孙朋刘波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去中学后面的河套，而是径直来到熊腩沟沟口那片深水域，脱光衣服，爬上砬头，终身一跃——结果，右膝盖被水底一块玻璃碴子划破，血流了出来。孙朋用红领巾给我包扎了伤口，刘波帮我背着书包，我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……

熊腩沟沟门那座石砬子上有一个山洞，传说住着妖怪，因为每天日出之前，常有白气从洞中飘出，且伴有莫名的声响，仿若仙境。我们总想去看。一天下午，孙朋的哥哥孙贺、杨柏栋的三哥杨柏良决定带我们一起去。没有手电筒，我们就点燃几张油毡纸当火把，又手持棍棒、石块，一边喊叫一边

小心翼翼地探进。自然，里面未见什么妖魔鬼怪，只有数十只蝙蝠横冲直撞，但这也着实吓了我们一跳。

后来知道，这个山洞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日伪时期，勘探队为寻找矿脉用火药炸开的一个洞穴。

之后，我再也没来这里游泳（确切地说是洗澡），更未进入这山洞。如果去熊腩沟玩，或是去那片野地挖菜、打猪草，也只是远远地望望那被杂树和乱草遮掩的洞口。偶有野鸡起落，但我抓不住。前面说过，这不是我的强项。不像孙朋，他就曾在这里打到过一只肥硕的野鸡，用他家那支老洋炮。

孙朋不仅枪法准，弹弓也打得利索，不像我和刘波拖泥带水。我和刘波虽然也有弹弓，但不仅很少打到鸟儿，还时常被皮筋崩手，甚至被反弹回来的石子擦破脑门。孙朋也常做弹弓，用硬木叉和卫生所医务人员废弃的听诊器，或自行车里带，弹兜也是皮手套剪的椭圆形，总之，讲究得很。不过这样的好东东，他并不舍得给我们，而是揣裤袋里去河北沿老单家。河北沿即河套北岸。老单家小福子长我们几岁，同我三哥孙朋哥刘波大姐一

屈，但因患小儿麻痹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。小福子很聪明，也会做弹弓、渔网鱼叉，所以孙朋就愿意和他在一块玩，可谓技术交流。

印象中，我也去过老单家多次，但未必是去学什么经验——学不会啊！去，往往是因为借什么东西，比如在河里洗父亲在井下穿的黑作业服，突然棒槌被水冲走了，追不回来，就只好踏上木板桥去他家借。有时家里没人，院门敞着，就径自拿了。因为老单家和我们一样是工人户，就觉得亲近些，不像其他几个农民户，来往少。

其实，孙朋和小福子他们尽管心灵手巧，能做弹弓及其他，但他们一定不会做匕首火药枪。能做这些的是更大的孩子，或者已经不是孩子，而是社会青年了。他们用汽车上的钢板打磨匕首，用不锈钢管和自行车链子制成能够转动的连发枪，当然只装火药，没有子弹。而随着一次次严打，最终也都销声匿迹了。这是另一个话题，打住。

在我居住生活了十六七年的树基沟小镇，并未发生多少严重的自然灾害。1976年海城大地震曾波及这里，除人心惶惶外，也没造成什么后果。水灾呢？倒是发生过。那时候，总觉得夏天多雨，连绵十几天，甚至数十天。无疑，这将给农民的收成造成很大影响，即使我们工人户也心生厌烦。雨不停，出不了门，母亲就从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向门前的栅栏下使劲地掷去，据说这样老天爷才会眨动眼皮，驱云止雨。如果凑巧，雨停了，或是渐渐地小了，我们就会冲出房门，手里拿着塑料桶、箢篱，奔向河套。是的，我们去抓鱼！

这时，洪水已经溢满河床，淹没两岸上的田地。鱼，肯定是有。我虽不谙此道，但觉得好玩，或者说不能不去这么做——鱼可是白捡的啊！而老单家和居住在北岸上的几户人家，则顾不了这些，他们正用水盆和瓢从屋里往外舀水呢，门前那座木板小桥也早已没了踪影。当然，桥，日后还会重搭。铁轨和木板，矿上也会再给。

这是夏天，一切似乎还好。

如果是冬天，冰面尚未封冻，没有桥就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。那年三九天，北岸的一户农民去熊腩沟朋友家喝酒，回来的路上就掉进了冰河里，睡了一夜，再没醒来。